

19.05



曲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曲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13

目 录

朱德同志为《曲江日报》题写报头的回忆……	丘富盛 (1)
回忆陶铸同志在曲江的革命实践……	丘富盛 (4)
谈谈解放初期曲江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陈锡梅 (10)
抗战时期省新运妇委会在曲江开展工作的情况……	严开 (16)
清及民国时期的农业税……	利兑 (23)
建国前曲江县财政税务大事记……	贝木 (28)
教育先驱黄开光先生……	伍焕新 (32)
清宣统三年我县学校概貌……	历古 (38)
九龄农学院撮述……	伍焕新 (40)
清及民国时期曲江县工商管理和集市贸易概况 ……	工商编志组 (43)
建国前曲江县的市場设置与变迁……	何巫整理 (61)
抄民国时期曲江县县长姜玉笙 “提请恢复烟赌禁令案”文……	李育廷 (66)
民国时期曲江县粮价暴涨惊人……	方元昇 (68)
日寇三犯重阳村……	黄泽 (70)
陈汝棠先生脱险小记……	李景昌 (74)
略述解放前曲江县粮食仓储和加工情况……	米良 (78)
侯文俊生平追忆……	历古 (83)
北江水系在曲江境内主要支流概况……	严实 (85)

朱德同志为《曲江日报》

题写报头的回忆

丘富盛

我手上珍藏着一份纸质已变得发黄的报纸。它是一张距今已达30年的《曲江日报》。每当我展开那张报纸，朱德委员长为报纸题写报头的往事就历历在目，回忆他老人家对曲江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1958年春末夏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县委决定把县委机关报《曲江报》改为《曲江日报》。报纸改版后请谁为报纸题写报头呢？报社的工作人员议论开了。当年曾采访过我县农民运动史的编报、记者建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老总曾在曲江有一段革命实践的历史，他老人家和曲江人民心连着心，如果能请他为报纸题写报头，既能为县报添光增色，也会给全县干部、群众以巨大的鼓舞。

那是1927年的往事：当时曲江县的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规模巨大的“西水暴动”，各地的贫苦农民高举犁头会的旗帜，向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展开了顽强的斗争。那年的农历12月初5日，国民党民团1000多人，对我革命老区青水塘、暖水等地进行大扫荡，把青水塘村包围得水泄不通，那时村内只有农民赤卫队四、五十人，土枪土炮四、五

十枝。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农民赤卫队处境十分困难，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一部分队伍，转道福建、江西，历尽千难万险，来到犁铺头（即今犁市镇），在那里驻扎休整。为了保存这支革命队伍，朱德同志化名王楷，成为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手下的一名团长。那时，重阳乡地主武装的头子冯佩赞、雷丰霖因急于攻下青水塘村，就派人前往犁铺头请国民党的正规军增援。不料，“请”到的竟是朱德同志化名为王楷的部队。在朱德同志所部的配合下，打死打伤民团近百人，取得了青水塘战斗的胜利。击溃民团后，朱德同志在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会上讲话，烧了瓦屋盖新房。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夺取胜利。从此，曲江县的农民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有力的打击了封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报社工作人员听到这一革命史实，受到教育和鼓舞，决定写信给朱老总，要求他老人为县报写报头。县委指定我负责当年的报纸工作，我受大家的委托，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朱德同志。7月下旬，报社就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复信，附来了朱德同志的亲笔题字：“曲江日报”四个笔尖锋利、刚劲有力的大字，并勉励报社工作人员要努力办好报纸，努力学习、宣传、实践毛泽东思想。县委领导同志和报社工作人员看到朱德委员长的题字，个个心情都很激动：朱委员长的心贴着曲江人民的心啊！他老人家日理万机，还把曲江人民惦记在心，还为一个小小的县报题写报头，真难得呀！在朱德同志题字的鼓励下，报社工作人员同心同德，抓紧改版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的八一建军节的那天，

由朱德同志题写报头的《曲江日报》就套红和读者见面了。为了把这一真实情况告诉全县人民和广大读者，就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通讯。

回忆陶铸同志在曲江的革命实践

丘富盛

陶铸同志在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曾多次来曲江指导、检查工作。1957年至1958年期间，笔者曾在《曲江日报》工作，为了报道的需要，曾两次跟随他作过采访活动。这里记述的是当年两次来曲江活动的片断。

陶铸同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第一次来曲江的时间是1957年8月17日至8月31日，历时14天。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白土蹲点，指导整风整社。第二次是1958年7月25、26日。这一次，他是在当年韶关地委第一书记左铭、中共曲江县委第一书记马植田、书记杨文挺的陪同下，检查了我县白土中乡农业合作社和马坝龙岗、阳岗农业合作社的晚造生产。这两次革命实践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他那种艰苦深入、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生活的作风，却在全县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策至关重要”

1957年，全国各地正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陶铸同志来曲江白土蹲点，开展整风整社工作，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城市的反右派斗争波及到广大农村，很多农民都惶惶不可终日、

怕被当作牛鬼蛇神横遭批斗。起初，驻白土中乡抓点的工作队，也试图发动农民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抓牛鬼蛇神。陶铸同志发现后，语重心长的告诫大家：党的政策至关重要，万万不能粗心大意。农村整风整社的目的，是通过鸣放，让农民充分暴露各种模糊思想，有的放矢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是为了抓几个反面典型进行辩论。就是个别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也应该着眼于教育。在陶铸同志的教育、指导下，运动健康发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当年，农村中有的农业社办得不那么好，有的农民要求退社。这样，不少地方采取限制的办法，有的地方却又放任自流，对退社农民不闻不问。陶铸同志知道后，语重心长的对县、区、社干部说：这样时“左”时右不对。“左”在不给退社自由，右在退社后放任不管，不是用姜大公钓鱼的办法。他形象地说，姜大公钓鱼，钩是直的，没有钩的，愿意的就上钩，不愿意的，钓后也可以让它掉下去，不要钩住它。我的意思要全面理解，现在农民坚决要退的给他退，但退出去后要加强教育、管理，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得大家会意的点了头，表示要按陶铸同志的指示办好合作社。

“当干部的要学会为人民服务”

陶书记很关心社干部，叫社干部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他针对办社初期干部作风生硬的情况，谆谆教育干部，要学会为人民服务，当好勤务员。他说：“社干部能参加生产，有事同群众商量，账目公开，就可以把农业社办好。”“农业社好象一个大家庭，干部要关心每一个社员，才能使社员爱社如家。”“干部要帮助社员

开展家庭副业。帮助他们多养猪、多养三鸟，解决劳动力出路问题，不要什么都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陶铸同志针对一些农村干部工作方法粗糙、思想工作不到家的情况，教育他们：思想工作要经常抓，不能一劳永逸。他形象地比喻：做思想工作象打球一样，泄了气打打气可以再打，如果泄了气就不打气，再好的球也要报废。这个深入浅出的打比，说得在场的干部都会意地笑了。

为了给农村干部树立服务员的形象，陶铸同志身体力行。他在白土蹲点时，已是五十内外的同志了。他身居高位，仍然选择中乡社为点。他工作艰苦深入，每天除听会报外，还亲自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民情、收集民意，还常常深入农民家里去访问，抽空种黄茂高产试验田，和农民交朋友。

1958年7月25日、26日，陶书记到白土、马坝检查工作。那时正是“大暑”季节，气温高达36—37℃。为了了解马坝农业生产情况，26日早饭后，他在左铭、马植田等地委、县委领导陪同下，冒着高温酷暑，从白土步行来马坝。他汗湿衣衫，但谈笑风生。他路过龙岗社时，发现白土中乡社青年队与龙岗社青年队开展劳动竞赛，就在田边找两个队的队长座谈，鼓励他们赛干劲、赛风格。并对在旁的地、县领导同志说：“这种方法好，可以推广。”他参观了解了龙岗社、阳岗社后，来到马坝时，已是烈日当空、时针指向12点了。中午稍事休息，立即找来马坝区委的同志汇报。在这过程中，陶铸同志听到了当地农民在狮子岩洞穴内挖取磷矿石过程中发现了人头盖骨化石时，感到莫大的兴趣，立即要在场的同志拿来化石样本，他左端详右细看，凭着他渊博

的知识指出，这是一件可贵的文物，是一块人头盖骨化石。然后，他指示区党委的同志要保护好文物现场。在陶铸同志的重视下，经过有关部门鉴定，终于发现了距今十多万年前“马坝人”头盖骨化石。从此，“马坝人”闻名中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陶铸同志的功劳，是他深入群众、脚踏实地结出的硕果。

“要重视农业技术改革”

技术就是生产力。这是一句时兴的说法，是人民群众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早在50年代，陶铸同志在我县白土蹲点时，就常常向干部群众宣传：“要重视农业技术改革。”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群众：谁抓了良种，搞了合理密植，进行科学种田，谁就能多打粮食。他走一路宣传一路。1958年7月26日，陶铸同志从白土步行至马坝，途径欧山村时，发现有的社员插秧不合规格，株距宽、禾行不直。他语重心长的向同行的各级干部说，要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必须抓好以密植为中心的技术改革。要从思想上、操作方法上来个大转变。过去人们是存在“密不行，要大兜疏植”的思想，和插秧操作方法不及格，禾苗可多可少，距离可宽可窄的情况，这些都要改变过来，达到插秧规格化，就是要达到密（每亩60万穗以上）、直（禾行要直）、方向对头（晚造禾行向南）的标准。否则，禾行不直、方向不对，禾苗长大封了行，就象房子不通风一样，易生“稻热病”，达不到增产的目的。说得在场的干部农民都点了头，表示要按陶铸同志的指示办。陶铸同志途径龙岗中厂村时，发现有的社员用划行器、插秧船，就高兴的说：“这个办法好，这些新技术

要推广。”他认为，靠两只手插秧稍不小心就会弯曲，有了划行器就能插得直了。插得密了，劳动量大，劳动力负担重了，就要大力推广插秧船。他打了个比方：好象开会一样，如果站着开两个小时就吃不消，坐着开四、五个钟头也没有关系。插秧也一样，坐着插就舒服得多，可以减少疲劳，提高效率。

为了抓好技术改革，陶书记还带头种“试验田。”他在白土中乡社蹲点时，发现社员种番茨还是种长藤，不下基肥。为了推广新技术，他叫社主任找到一块长条形的秧地，用短藤密植法种植，叫区长以后代为管理，收获时与种长藤苗的对比。起初社主任开玩笑地说：“土质条件不一样，产量当然有差别。”为了用事实教育农民，陶铸同志将那块秧地一分为两，一半由该社种长藤，一半由陶铸同志领导工作队种短藤，有湖南式的、湖北式的、梅县式的、五华式的、粤北综合式的。以后收获的产量表明：短藤密植比长藤疏植成倍增产。

“要搞好农村的建设”

陶铸同志十分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他在白土蹲点时多次强调：随着生产的发展，各地都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帮助农民建新村。他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收入现状出发指出，不能一哄而起，不能希望在一夜之间把农村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如何建呢？除了茅房、厕所、牛栏和破烂的可以拆掉外，其它都不要拆了，可以进行改建。不够住的才按新设计进行新建。为了摸索经验，陶铸同志对地、县领导同志说，凡是过了水利关的，生产又搞得比较好的，各县都要

在秋收后选择几个社先搞，以便树立榜样，推广全面。陶铸同志这些设想，后来因为“左”的思想影响未能实现，但是，他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步骤，还是具有现实性和指导性的。

陶铸同志很重视农村卫生工作。他一次去下乡农业社检查，看到一位青年人的家庭院落干净整齐，高兴的说：“可以做卫生模范”。他看见农村的许多沟渠很脏，就多次对区、社干部说：农村卫生问题，要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要教育农民转变思想，树立新观念，人人动手搞好卫生。他主张每个自然村都建一个肥料湖，发动社员清除垃圾积肥，这样既可以多积肥，又可搞好卫生，一举两得，办法简单。

关心群众生活，陶铸同志反复教育各级干部：不但要关心吃、住问题，还要关心社员的娱乐、小孩的读书、幼儿的入托、五保老人的赡养等等。他指出，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办俱乐部、文化室、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农业中学，等等，还要抓好农村道路、桥梁的修理，从各方面改善农村的环境，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谈谈解放初期

曲江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陈锡梅

解放初期，曲江县曾经举行过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届会议是在1950年4月召开的，会议制定并通过了曲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章程和关于剿匪反霸、生产渡荒等重要决议；二届会议是韶市撤市设镇后于1950年12月县、镇两个代表会合并举行的，会议作出了“为胜利完成全县土改而奋斗”的决议；三届会议是全县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6月召开的，会议顺利完成了抗美援朝的扩军任务，作出了镇压反革命、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等决议；四次和五次会，是曲江县和乳源县合并为曲江乳源县后，在1952年土改复查期间和复查结束后召开的。这些会议，紧紧围绕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各项工作，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政权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曲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

曲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根据中央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精神筹备召开的。它是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一种组织形式，对人民政府的工作起监督和协助的作

用。

第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国民党的县“参议会”具有本质的区别。县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基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代表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共同纲领。它是各阶层人民自己的会议，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致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会议。而国民党的参议会国民党为实现其统治，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的御用机关，是为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服务的。

第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宪法产生实施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县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听取县人民政府关于施政方针、政策及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并提出批评建议；二是向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建议有关县政兴革事宜；三是向人民群众传达和解释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案，并协助政府推行。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机构叫做“协商委员会”，在代表会议闭幕之后，行使下列职权：1、协助县政府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2、协商并提出对县政府的建议；3、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征粮、剿匪、清霸反特、减租退租等；4、负责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5、负责本县民主统一战线工作；6、负责联系代表，经常征询和反映群众对政府的意见。由此可知，它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两个方面的部分职权，但不是“最高权力机关”。

二、曲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特点

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刚刚建立，面临一副千疮百孔的烂

摊子，百废待兴，困难是不难想象的。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客观条件。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举行的，也就具有当时的各种特点。

（一）代表成员的广泛性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首要特点。广泛性主要体现在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有代表参加会议，因而代表就更具有代表性，使人民政府能够听到各阶层人民的意见和呼声。从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184名代表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农民代表80名，工人代表8名，教育界11名，宗教界1名，文化界1名，妇女界6名，商界10名，开明绅士8名，青年学生5名，烈军属5名，党政机关13名，驻军代表5名，区域代表24名，少数民族2名，特邀代表3名。这是建国初期，曲江县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

（二）产生代表方式的多样性是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二个特点。解放初期，由于许多群众团体尚未组织和健全起来，普遍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的条件尚未成熟，因而代表产生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一是党政军机关代表，由单位“推定”，报筹委会聘请；二是农民、工会、妇女、青年、文教、工商等各界代表，由各团体自行“推举”二倍至三倍于代表名额的人选，送筹委会审查决定聘请；三是其它各界代表，如医务界、宗教界、手工业者等由筹委会征询各界人民的意见后直接聘请；四是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知名度较高的民主党派人士由政府特邀。

（三）会议职能具有两重性是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个特点。一方面，人民代表会议对政府工作实行监督，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收集提案，反映人

民的意见与要求，具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某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协商委员会，又是协商机构，其基本职能是向人民政府提出建议，协商工作，开展民主统一战线，做好团结民主党派的工作。这两个方面基本职能的有机结合就是代表会议的基本特征。

（四）民主气氛浓，敢于讲真话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第四个特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善于听取代表的不同意见，使代表们真正敢于畅所欲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胆发表意见，批评政府的工作。党政领导对代表批评政府的工作，党政领导对代表的批评意见，特别是那些刺耳的话，坐得住，听得进，坚持言者无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不同意见，能让人把话讲完。使党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发扬。

（五）农民代表的比例逐届上升是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五个特点。解放后，随着农村土地改革、土改复查的完成，农民提高了政治地位，增强了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农民代表的比例适当增加是应该的。从历届农民代表的比例看，第三届起，农民代表的比例就占得过大了，第一届为44%，第二届为55%，第三届为75%，第四届竟高达84%，在251名代表中，农民占了211名。农民代表的比例太大，必然会失去“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原来的意义，变成农民的代表会，不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三、曲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作用

曲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解放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认真履行党和人民赋予它的职责，团结全县各阶层人

民，完成了历史性的任务，它的历史作用是必须肯定的。

第一、各界代表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参政议政，对政府工作起了监督作用。一方面，各界代表积极收集提案，向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见与要求，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五次会议共收集提案1010件，其中首次为175件，平均每个代表收集一件，第五次561件，平均每个代表收集二件，其余各届人均不足一件。这些提案，绝大部分都提得正确，对促进政府的工作，帮助政府实现施政方针，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各界代表认真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工作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有的批评尖锐深刻，切中要害，对于帮助政府克服官僚主义、保持廉洁作风，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各界代表积极拥护土地改革运动，为全县胜利完成土改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土地改革是我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它必将带来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又必将带来市场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兴旺，这是各界人民代表的共同愿望。这充分说明，土地改革同各阶层人民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因而它不但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而且也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共同利益把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各界代表都纷纷发言表态，拥护土地改革，为这一历史性社会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解放初期人民政权的首要任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自己的工作，宣传和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民，打击了土匪、特务、地主恶霸等国民党的残

余势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许多人民代表带头报名参军，因而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以实际行动保卫胜利果实，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贡献。

第四，在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中，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巩固革命政权的重要前提，在解放初期具有特殊意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把社会上知名度较高的各民主党派和开明绅士聘请为代表，并把其中一些人选为协商委员，对于党和人民政府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起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如原国民粤北行政公署专员沈秉强先生被聘请为特邀代表后，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多办好事，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做出了贡献，对做好统战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